

# 近代声音史料的相互关联

——以民国时期上海唱片为中心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葛涛

记录、复制与传播声音，是自古以来人们共同的梦想，无论身处西方，还是中国。只是在近代科技尚未发达之前，此类奇思在世人看来，几近怪诞。如清代袁枚在鬼神笔记《子不语》中记有“江秀才寄话”一则，描述了清人对于录音的遐想：婺源江秀才…置一竹筒，中用玻璃为盖，有钥开之，开则向筒说数千言，言毕即闭。传千里内，人开筒侧耳，其音宛在，如面谈也；过千里则音渐渐散不全矣。<sup>1</sup>袁枚生活于18世纪，而其笔下江秀才制作的录音设备，与一个世纪后爱迪生发明的蜡筒式留声机的形状及工作原理，在构想上有相似之处。然而在近代科技尚未昌明之时，此类构想在传统文化中只得归属“怪力乱神”之类。但是古人对于声音记录、复制及传播的向往，为以后唱片在近代中国社会中的运用、普及做了文化上的铺垫。自1877年11月爱迪生研制出世界首台留声机，以及19世纪90年代伯利纳率先成功制作出唱片以来，人类记录及复制声音的梦想成为了现实。从此，人类可以从声音的角度记录社会发展的进程，一种传承历史的新媒介随之出现了。

十九世纪是工业革命在西欧、北美蓬勃开展的年代，工业文明的浪潮由欧美席卷世界的绝大多数地区，极大地改变了人类历史的演进过程，同时也改变了人们认识、记录历史的路径与方式。尤其是照相、唱片、电影等的问世，不仅使社会生活的内容为之改观，也使人们得以在新技术的基础上，从新的视野、以新的方式去记录、解读历史。其中，唱片的诞生及其运用、普及，就从声音的角度为诠释历史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 一、唱片作为史料的特性

近代中国最初接触留声机的，是洋务运动兴起后由清政府最初派遣往英、法、德等西欧国家的外交官、留学生、军事专家等。从19世纪70年代末起，直至90年代初，伴随着蜡筒留声机由问世到成熟，以及唱片的兴起，他们在海外亲身体验了声音技术史上划时代的革命，对此印象深刻，做出了诸如“真神技也”（郭嵩焘语）、<sup>2</sup>“此则尤变化出奇矣”（薛福成语）<sup>3</sup>等高度评价。他们将早期的蜡筒留声机分别命名为“传声机器”（郭嵩焘）、“记声器”（徐建寅）、“纳音器”（薛福成）等，较为准确地把握了其最本质的功能——记录与传播声音。

虽然最初接触留声机的中国人基本属于对西方事物持较为开明态度的洋务派要员，但他们同时也是传统文化中的精英之士，上层统治集团成员。他们对于留声机、唱片作用与意义的见识、评价，极大地影响了其在近代中国社会传播、运用的历程。唱片作为史料的成长过程，也与此密切相关。

所谓史料，可理解为记录、承载历史的载体。传统、主流的历史记录载体为文字。截至当下，文字作为史料的地位依然极为重要。但是，文字从来不是惟一的历史记录载体。自古以来，图像、艺术品及其他物质文化遗存、非文字的精神遗产等也是重要的史料，例如绘画、雕塑、建筑、器物、习俗、礼仪等。随着

近代科学技术的进步,近代史料的内涵也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与提升。但是不可否认,传统史料的延展与改良是其主要表现形式,如图像史料,即由绘画扩展至照相,以及电影等活动影像。虽然从科技史的角度而言,照相、电影等均属近代科技产物,与绘画并非同类;但是就史料类别而言,则均可归为图像或影像史料。然而以唱片为标志的声音史料,作为记录历史的载体,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新兴史料。它的出现,使历史记录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

从蜡筒到唱片,人类在近代科技的引领下,完成了记录、复制声音的过程。用记录声音的方式记录社会生活,是唱片作为史料的本质与原点。作为一种凭借听觉感知的史料,唱片虽然与文字、图像等载体在形式、表现内容、侧重点方面存在明显不同,但是在记录历史这一点上是相通的。唱片作为新兴史料,其记录历史具有形式新、角度新、内容新,以及高度真实的特点。

形式新。无论是早期的蜡筒,还是其后在较长时期内成为录音制品主流的唱片,从史料的角度出发,其形式均属闻所未闻,令人耳目一新。从材质、外形,直至制作、保存方式,蜡筒与唱片均闪耀着近代科技的光彩,为工业化时代以前所无法想象。当中国人最初接触时,无不受到强烈震撼。如郭嵩焘于 1878 年 5 月 20 日在伦敦出席某次茶会、首次观摩由爱迪生为其演示的留声机操作时,震惊之余,对过程进行了详细描述,<sup>4</sup>发出了“真神技也”的感叹。<sup>5</sup>又如 1890 年春季出版的《格致汇编》,其“格物杂说”栏载有“新翔记声器图说”一文。作为中国首篇全面介绍蜡筒留声机的文章,作者傅兰雅在文中评价留声机的发明“不独为千古之奇闻,亦实为记载之妙筒”。<sup>6</sup>值得一提的是,傅兰雅介绍的蜡筒留声机,仍是爱迪生公司的产品。从郭嵩焘首次观摩,到傅兰雅撰文介绍,留声机从最初诞生阶段逐步趋向成熟,在欧美各国已得到一定程度的推广,并被引入中国。但在身为英国传教士的傅兰雅眼中,依然被视作堪为旷古奇思的发明。留声机、蜡筒、唱片以其全新样式给社会带来的冲击,由此可见一斑。

角度新。以真实的声音记录为原始资料,反映、展现历史场景;以声音内容的变迁为线索,追寻历史发展的脉络。这是唱片作为史料的独特角度,也是最重要的特性。在留声机传入中国之初,就有人意识到这一点。如傅兰雅就在“新翔记声器图说”中指出:……**后知此器不但为取乐开心之用,将来能记人言语而发复声,可省书写之烦。如名人善言好语,传流后世千载之下得闻其声,不吝亲见颜色;或将方家音乐歌曲记存音调,后之学者使复发声,宛如面听其奏。**<sup>7</sup>

无独有偶,以别署“高昌寒食生”闻名的晚清上海报人何桂笙亦持相同观点。他于 1890 年 5 月 3 日的《申报》上撰文“**留声机器题名记**”,文中设想了留声机在未来社会中的几种“正用”,其中包括如何对待家训或长辈遗嘱的问题。他认为家训、遗嘱等若相隔时间久远,难免被后辈遗忘;但是如果用蜡筒收录祖辈之原音,那么无论时间相隔多久,子孙只要“**开筒敬听**”,就如同先人当面再次教诲一般,可谓“**形容虽渺,声教常存,其为正用也大矣。**”<sup>8</sup>

由是观之,留声机传入之初,就有人敏锐地认识到了其作为史料的优点、特性。认为与文字史料相比较,除了有轻简之便、较少讹误外,更容易使后人在听取时产生较强的历史现场感。换言之,历史场景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生动还原。在这一点上,非但传统史料无法企及,即使如照相等同时代诞生的新兴史料也不能做到。根本区别在于传统史料及其照相是静态的,而蜡筒、唱片借助于留声机可发声,为动态。在电影问世之前,应为唯一的动态史料;而在有声电影诞生之前,则为唯一的有声史料。由于蜡筒是录音技术的初级产品,从问世至遭淘汰为时仅二十余年,作为史料的价值有限,因此近代有声史料主要是指唱片。有声、

动态，是唱片作为近代新兴史料所具有的最为独特而不同凡响的角度。

内容新。唱片作为一种独特的新史料，必然会在内容上得到印证。由于唱片记录、保存、复制的对象是声音，因此必须从声音的角度出发，解析其史料价值，探究以声音变迁为主线构建的社会历史演变框架。分析这个问题，应从人们对于声音记录的选向入手。自留声机问世以来，数十年内，人们基本上将其作为一种纯粹的娱乐工具加以看待。这主要源于社会对于声音利用的价值取向，包括唱片制售商的商业考量以及民众从声音中追寻娱乐的渴求。考察唱片内容、种类的变迁，即可从声音角度还原近代中国社会娱乐发展史。留声机传入中国之初，被称为“唱戏机器”，唱片则被称为“戏片”。二十世纪初，英商谋得利洋行宣传自己代理的英、美品牌留声机为“**新式顶响唱戏机器，比戏台上唱更响，永远不坏**”，唱片种类则“**京调、徽曲、广调、昆腔、帮子、各省小曲、洋操时调、男女哭笑，一应俱全**”。<sup>9</sup>上海法商百代公司曾称本品牌留声机为“**寰球第一之唱机**”，<sup>10</sup>第一批录制的唱片基本为京剧名伶演唱，从而为百代唱片的声誉奠定了基础。根据对《中国唱片厂库存旧唱片模版目录》（中国唱片社 1964 年编辑、出版）与公营大中华唱片厂唱片目录资料进行整理，可知近代上海 6 家唱片公司（百代、胜利、大中华、高亭、蓓开、新月、长城）录制的戏曲唱片种类如下：京剧（老生、小生、武生、青衣、花衫、老旦、大面、丑），昆曲，评剧（蹦蹦、碰碰），河北梆子（梆子），乐亭影，滦州影戏，北方戏，河北戏，山西梆子（梆子），秦腔（梆子），山东梆子（梆子），山东剧（五音戏子），河南梆子，汉剧，楚剧，花鼓（花鼓调），宜昌剧，湘剧，扬剧（维扬戏、扬州小曲、扬州小调、扬州弹簧、扬州时调），常锡戏，沪剧（申曲、本滩、东乡调），滑稽（宁波滑稽、北平滑稽、唱春、零头戏、滑稽苏滩、文明宣卷、滑稽小曲），杭剧（杭州小曲、小调、杭州调），绍剧（越调、绍兴戏、绍兴大戏、越剧），越剧（绍兴文戏、绍兴的笃、绍兴滩簧），甬剧（甬滩、宁波滩簧），福州剧，福建剧，漳州剧，厦门剧，粤剧，客家，潮州剧，川剧，梁州影戏，滇剧，西藏剧，舞台剧，以及“剧种不详”若干，计 39 种。近代上海 4 家唱片公司（百代、胜利、高亭、蓓开）录制的曲艺唱片种类如下：京韵大鼓（京音大鼓、附：滑稽大鼓），铁片大鼓，梨花大鼓，梅花大鼓，奉天大鼓（奉调大鼓），乐亭大鼓，西河大鼓，河间大鼓，大鼓，八角鼓（八角快书、单弦、长唱），平津什曲（北京小调、鸳鸯调、靠山调），莲花落（附：北通州莲花落），平津快书（天津快书），连珠快书，五音联弹，相声，保定西河调，山东小曲，山东琴书，河南坠子，河南小曲，苏滩，苏州文书，评弹，四明南词（四明讲卷），四川琴书，口技，计 27 种。

自唱片传入中国以来，几乎所有的近代京剧名伶都有唱片存世。以百代公司为例，就为王鸿寿、马连良、王玉蓉、梅兰芳、李桂春、张文艳、孙庆芬、陈月梅、双处、言菊朋、王又宸、吴彦衡、王少楼、李洪福、王世续、王竹生、王泊生、萧长华、王雨田、金少山、王重选、叶元章、厉慧兰、厉慧良、厉慧君、厉慧敏、厉慧森、厉慧斌、关正明、周正荣、刘天红、刘叔度、刘永奎、刘鸿声、沈一震、焦宝奎、新艳秋、马连昆、陈少霖、陈平福、陈善甫、景佩芳、景玉峰、汤桂芳、陈鹤峰、杜文林、苏兰舫、小杨月楼、李正庵、吴继兰、李白水、李桂芳、李盛藻、时慧宝、李多奎、裘桂仙、余叔岩、迟世恭、孟小冬、洪天韵、高百岁、高庆奎、郝寿臣、夏山楼主、秦美云、穆艳云、张少泉、金碧莲、张如庭、张紫宸、张筱轩、常立恒、贯大元、贯盛吉、于芝珊、王幼卿、刘元彤、杜元田、谢世安、李世芳、甄洪奎、高华、杨宝森、杨瑞亭、筱月红、筱香红、筱菊红、筱爱茹、鲍吉祥、律佩芳、陶默厂、管绍华、吴彩霞、李宝奎、谭小培、王芸芳、

小神童、谭富英、谭红梅、谭鑫培、露兰春、毛世来、江世玉、朱荣奎、徐碧云、小奎官、姜妙香、白玉崑、刘砚芳、李吉瑞、黄元庆、杨小楼、小翠花、马富禄、杨菊笙、葛华卿、王幼卿、詹世辅、曹世才、关丽卿、刘筱衡、韩金奎、朱琴心、孙庆芬、杜丽云、吴富琴、林绮梅、尚小云、胡碧兰、卧云居士、荀慧生、郭效青、顾正秋、徐东霞、徐东明、章遏云、梁小鸾、张君秋、黄桂秋、程玉菁、程砚秋、杨畹农、蓉丽娟、小宝芬、刘斌崑等录制过唱片，涉及老生、小生、武生、青衣、花衫等行当。

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随着《毛毛雨》被百代公司录制成唱片、传唱于大街小巷，“时代曲”即流行歌曲唱片逐步受到社会欢迎，成为三、四十年代唱片的主流。与此同时，唱片内容呈现出多元化；时代气息也变得强烈起来。这种现象一方面反映了民国时期唱片业的繁荣与成熟，也为当时的社会生活留存了多方位、生动的声音记录，展现了城市发展、社会生活变迁的线索。

例如，上述“时代曲”唱片的流行，即可视为民国时期以上海为中心、城市社会发展的明证。“时代曲”的格调、词曲内容，深合广大城市居民的情趣、欣赏口味，唱出了他们日常的喜好和所思所想。而其他种类、内容的唱片，也是城市社会生活声音印记的一部分。因此，包括“时代曲”在内，各种唱片的内容变化以及流行情况，是从声音角度解析民国时期城市社会生活史变化的重要历史证据。

民国时期唱片内容的多元化，体现在除了戏曲、音乐歌舞之外，也包含政治、教育、公益、商业等方面的内容。以政治性内容的唱片为例，即有国民党当局大力推行的“名人演讲”、“党歌”唱片，其中著名的有“国父遗声片”（公营大中华唱片厂代制 编号 1338、1339）、<sup>11</sup>汪精卫关于时局的“留声话片”，<sup>12</sup>以及“中华民国国歌”（公营大中华唱片厂制 编号 36021 大中华管弦乐队演奏）、“中国海军之歌、中国海军进行曲”（公营大中华唱片厂制 编号 36147 大中华合唱队演唱）、“中国空军之歌”（公营大中华唱片厂制 编号 36063 大中华合唱队演唱）等。<sup>13</sup>这些唱片，从声音的角度展现了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政治生态，不失为研究民国政治演进的珍贵史料。以“名人演讲唱片”为例。大中华唱片厂代制的“国父遗声片”分为“勉励国民”与“告诫同志”两张，最初系由上海《中国晚报》留声部于1924年在广州为孙中山录制，为孙中山唯一存世的声音资料。当时，孙中山正计划北上与段祺瑞会晤，共商国事。孙中山在唱片中，以具有感染力的声调，阐述了中国从“世界上头一等的强国”沦落为当今“世界上顶弱顶贫的国家”的原因在于“政治堕落”，号召国民“警醒”起来，挽救中国，负责即会陷入“亡国灭种”的危机之中。这两张唱片，后由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以“国父留声”的名称发行。至于其他非政治性内容唱片的史料价值，亦大致如此。

民国时期唱片内容的特点除了丰富、多元化之外，还富于流行性，时代感强烈。以“时代”歌曲唱片为例。为了追赶、迎合、捕捉城市居民不断变化着的欣赏口味，各唱片公司竭尽全力推陈出新，录制新歌，发掘新星。“时代”歌曲唱片制作量大、销售量大，获利丰厚，但更新频率也很迅速；一旦在市场上过时落伍，即乏人问津，立刻由销售商实行折价处理。其他如深受城市居民欢迎的某些地方曲艺类唱片，也是如此情形。上述唱片对于研究民国时期城市居民的大众消闲文化，进而揭示城市社会生活的某些重要侧面，提供了富于变化感的、生动的史料。

高度真实。作为近代科技的产物,唱片可以完整、真实地记录声音,较之文字记录具有更高的准确性。早在留声机传入之初,傅兰雅、何桂笙等人即指出这一点,并认为可将其运用于司法诉讼。“**惟留其供词于筒中,则永无翻供之时**”,“**小民即使狡,当亦无所施其伎俩矣**”。<sup>14</sup>数十年后,随着唱片技术的成熟以及社会运用领域的拓展,这一构想竟成为现实。例如1937年5月7日,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第三法庭(设于上海)开庭审理一桩地价纠纷案件,在庭审过程中,原告呈上一张唱片,声称录有被告在外与人商议如何蒙蔽法庭的谈话。负责审理案件的民庭推事当场打开唱机听取唱片,证实原告所言不虚,于是这一重要物证为法庭采信,遂致被告败诉。<sup>15</sup>唱片的真实性不仅被用于司法取证,还被用作为个人的一种纪念。例如1932年10月上海有一家新设的中国灌音公司,其主营业务就是为个人录制唱片,即所谓“个人音片”。该公司宣称:“**无论何人,只要能说话、能奏乐、能歌唱,到本公司来灌音,费二元钱就可得着君自己声音所灌入的音片,故曰个人音片**”,“**从此以后,君能听到自己的声音和他人听君一样了!**”<sup>16</sup>除了自娱及自我留念之外,这种“个人音片”的意义更在于: **音片可致之远地,传之后世。所以可用照片之处,也可用音片;可用文字之处,也可用音片。凡各种声音,君以为有保留价值及可作为纪念者,均可前来录音。**<sup>17</sup>由此可见,时人已认识到唱片作为一种可流传于后世的纪念物的价值,并将之与照片、文字相提并论。这实质上也是对于唱片史料价值的准确论述,而近代科技所赋予的高度真实性,正是唱片成为史料的基石。

## 二、唱片在近代史研究中的作用

以上论述了唱片作为史料的四种特性。那么,唱片作为一种近代新兴史料,在近代城市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实践中,究竟发挥了何种作用?探究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把握唱片在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中所起作用的实质。如前所述,近代唱片的内容丰富、多元,从声音的角度涵盖了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然而唱片最本质的社会作用在于记录、传播声音。尤其是无线电广播于二十年代初在上海兴起后,声音传播范围由留声机时代的小众转向社会大众。随着声音成为无线电广播这一现代传播媒体的基本素材,声音的传播开始具有了深远的社会影响力。由于在民国时期的电台广播节目中,播放唱片占有极为重要的比率,因此唱片即成为了现代传播媒体的重要工具。在这种情况下,唱片的社会作用与社会影响力取得了飞跃。唱片作为研究近代社会生活史的史料,应围绕、贯穿声音传播及其社会影响这一基本主线。也就是说,唱片作为史料,是从声音角度对近代社会生活整体的反映。如此,则一方面可将唱片记录的内容纳入社会生活史的范畴,同时可从社会生活史变迁的整体视角出发、认识唱片的史料价值。

唱片对于近代政治的反映即可为一例。民国时期当局针对唱片出台的管制措施,就可视为“训政”时期国民党掌控社会意识形态的企图在声音领域的反映。1937年6月上海特别市政府教育局颁布实施的《上海市教育局审查戏曲·唱片规则》;1947年2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发布“**停止广播及灌制淫靡歌曲案**”训令、公布“禁用唱片表”;1947年9月,在国民政府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直接操持下,中国历史上首家公营唱片厂——大中华唱片厂正式营运;1948年10月,行政院公布“禁用歌曲清单”等,无不如此。以上举措,从声音的角度生动地映证、还原了国民政府时期实行社会统制的生态,将国民党力图通过唱片这一声音传播工具建立意识形态控制,以及社会进行抵制、反抗的过程揭示得非常清晰。对比聆听被列入“禁用唱片表”、“禁用歌曲清单”,以及公营大中华唱片厂为贯彻国民

党文宣政策而录制的唱片,并结合相关的文字史料进行研究,就会对此印象深刻。

唱片亦可作为研究近代经济生活的重要史料。但是这主要是指有关唱片业的文字资料,而非唱片的物质形态。在近代中国经济中,唱片业并不是一个重要的产业。从唱片业入手研究近代经济生活,还有其他更有价值的视角。例如唱片业作为一项近代产业的成长历程,就在近代中国产业发展史中具有典型性。又如近代中国唱片业历史最久、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企业——百代公司,就具有极高的近代企业个案研究价值。

必须指出的是:唱片作为史料最能体现其价值与意义的研究领域,是近代社会生活史、尤其是近代城市社会生活史。自传入之初起,留声机、唱片在中国的历史是以城市为中心展开的。这一点从经济史的角度已得到证实,然而在社会生活史领域的实证却更为丰富多彩、形象生动,因为这是唱片以自身作史料、以声音为内容所还原与展现的。城市是留声机、唱片进入中国的起点,城市社会为唱片业提供了赖以生存、发展的社会环境与市场。上海形成了近代中国的唱片业中心,这并不仅指经济意义上的“中心”,也意味着唱片所录制的内容,主要反映了上海等都会的文化与社会生活。一方面自清末以来,终民国之世,中国社会生活、尤其是城市社会生活的近代化在曲折中前行;同时唱片产业的发展也达到了一定的程度。这两方面因素相结合,使三十年代中期以后的唱片内容具有更为全面的社会及文化代表性。例如百代公司录制的戏曲、曲艺类唱片中,就包括了若干种流行地区较为狭窄,市场、影响极为有限的“乡野小调”,甚至还有藏戏等少数民族地区的戏曲。但是这并不影响近代中国唱片内容的主流,反映了城市社会生活的脉动与城市居民文化情趣的变迁。从清末单纯的以京剧为主的“戏片”,演变至民国时期、三十年代“时代曲”异军突起、大放异彩的局面,一部以声音为主线贯穿而成的近代城市社会生活史即于耳际响起,回荡于心胸之间。虽然从表面上看,这部以唱片内容作为基本史料的社会生活史,主要呈现了近代城市社会以声音为主的娱乐面貌,但实际情况更为复杂。如前所述,随着中国社会近代化程度的提高与唱片业自身的发展,唱片内容所涉及的范围早已超出了娱乐,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商业等社会生活的诸多重要领域。据此可以认为:唱片作为史料,从声音角度展现了近代社会生活史、尤其是城市社会生活史的较为完整的面貌,而并非只是单纯的声音娱乐史变迁过程。但必须指出的是:技术、商业特性导致唱片所展现的社会生活史,在内容与侧重点方面较之以其他史料为主所展现的社会生活史必然存在差异。

### 三、唱片作为史料的意义

在对唱片作为一种新兴史料的特性、作用进行分析之后,必须对其之所以能够成为史料的基础、条件作一番解读。其一在于技术、数量条件。研究近代社会生活史,无论是整体性或局部性的课题,均需要相应数量规模的史料。这是由近代社会的本质、特性所决定的。近代社会与前近代社会的本质区别之一,在于它建立在近代技术的基础上。近代技术的革命性进步,直接促使生产力水平发生飞跃,从而导致社会结构及运转方式的深刻变革。近代社会生活所呈现的前所未有的复杂、丰富多彩,根本因素就是技术进步导致的社会变革。近代中国城市社会的发展虽有其历史特殊性,但是并未脱离这一根本规律。因此面对近代中国城市社会生活史的研究课题,必须要有充足的史料准备。其中包括史料的数量、种类、技术含量等关键因素,而唱片就具备了以上各项因素。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中国的唱片产业趋于成熟，上海成为唱片业中心。以百代公司为例，三十年代中期唱片年产量达数十万张，每次发行“时代歌曲”唱片，数量均为一、二万张。<sup>18</sup>上海解放前夕，百代公司处于停产状态，但是公司所有的机器，包括从录音、唱片制造直至封套印刷的整套设备均完好无损；原材料储备充足，可供生产 70 万张唱片，倘若恢复正常生产，24 小时内即可制作两万张。<sup>19</sup>至于唱片的内容、种类，结合《中国唱片厂库存旧唱片模版目录》（中国唱片社 1964 年编辑、出版）与公营大中华唱片厂唱片目录资料<sup>20</sup>进行整理的结果，可知从 1908 年至 1949 年，上海各唱片公司先后录制的戏曲、曲艺、乐曲、歌曲，以及其他各类唱片共达 108 种，涉及社会生活领域之广泛可见一斑。就技术而言，近代中国所制售的各类唱片，绝大多数质量上乘。或为国内百代、胜利、大中华所产，或在外国唱片厂制成后返销国内。优质的唱片除了可清晰、完整地记录声音外，还利于保存，便于后世品鉴、研究历史原音的韵味与意涵。

综上所述，从数量、种类、技术等因素而言，唱片均是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生活史、尤其是城市社会生活史的宝贵史料。但是唱片成为史料还有另一个基础，即社会影响力究竟如何，是否足以具备史料的代表性。唱片通过声音传播对近代社会生活发挥影响、产生作用，其史料价值亦通过所记录的声音内容得到体现。由此引发的实质性问题在于：声音传播在近代中国城市社会生活中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如果唱片所记录的声音只是在小众范围内传播，那么从声音的角度出发、勾勒而成的近代城市社会生活就不具备典型意义。在唱片只是留声机附属品的时代，声音传播的情况就是如此。但是自从 1923 年 1 月 23 日中国首次无线电广播在上海成功举行之后，随着无线电广播事业的迅速发展，声音传播对于城市社会的影响力，以及城市社会生活对于声音传播的依赖程度，都发生了质的改变。相对于留声机，无线电台广播改变了声音传播的方式与本质。留声机是由近代科技所发明、创造的声音传播工具，是一种单纯的近代机械装置。留声机传入之初被称为“唱戏机器”即为明证。无线电台广播未兴起之前，留声机是唱片惟一的“发声”工具，曾被看作是留声机的附属品，有“留声机片”之称。留声机传播声音有以下特点：一、多为个人或家庭购置，以为娱乐之需。二、根据个体需求，自主选购唱片，以满足对声音的喜好。由此反映出留声机时代声音传播的社会特点：小众性与自主性。可见唱片作为声音载体，所能发挥的社会影响力有限；而社会对于声音的需求也相应地并未得到充分开发。无线电台广播兴起之后，由于其现代大众传播媒体的社会属性，所以声音通过无线电波传播，犹如文字、图像通过纸质媒体传播一般，成为媒体传播的内容，具有了大众传播的特性。无线电台广播的听众由此与报纸、杂志等纸质传媒的读者一般，虽然可自主选择所喜好、接受的电台，但对于电台所播放的声音内容，却基本丧失了参与、决定的可能性。留声机时代个人通过选购唱片所体现的、自主决定声音传播内容的权利由此消失，无线电台听众如同其他的传媒受众一般，受到电台播音内容的极大影响。自二十年代中期起，直至七十年代末电视机逐渐普及为止，无线电台广播是中国城市社会生活中举足轻重的大众信息传播工具。它可以使听众足不出户即可听戏、赏歌；快速知晓上至国内外大事、下至八卦小道、商品广告等各类讯息；还可聆听布道传教、经文解说等宗教内容。以上海为例。民国时期电台数量之多为全国之最：1934 年 2 月为 41 家；1937 年 7 月为 29 家；1939 年 1 月为 35 家；1948 年 5 月为 38 家；1949 年 5 月上海解放时为 45 家。<sup>21</sup>上述统计数据中还不包括未向当局登记、但是播音活跃的“非法”电台。1948 年昆仑影业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的电影《万家灯火》（编剧阳翰笙，导演沈浮，主演蓝马、上官云珠、吴茵等），

描述了抗战胜利后上海普通职员家庭的艰辛生活。其中一段情节为男主人公因长期失业不得不将家中的收音机送往当铺典当,而其母每日必听收音机,男主人公为此踌躇许久,才痛下决心。各电台每日向市民播送包罗万象的信息,而播放唱片则是播音的重要手段。1937年7月上海各电台每日播音总时间中,播放唱片的时间约占14.6%;1939年元旦上海29家电台播音总时间中,播放唱片的时间约占19.6%。因电台播放唱片并不向唱片公司支付任何费用,故以百代公司为首的各上海外资唱片公司曾于1935年正式致函国民政府交通部国际电信局,要求各电台必须先与唱片公司签署协议,然后方可在播音中使用唱片。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针对唱片的管制措施,也都是从广播管制的角度出发施行的。从无线电台广播在民国时期城市社会生活中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唱片在播音中所占的地位出发,完全可以认为唱片具有近代城市社会生活史史料的基础条件。

综上所述,唱片作为近代科技的产物,在人类记录、复制与传播声音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具有划时代意义。声音在近代社会生活中的本质,就是声音传播与社会之间发生的互动关系。留声机问世,启动了近代社会生活中的声音传播之路;而无线电台广播则以现代大众传播媒体的特性赋予了声音传播以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使其成为近代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此后,声音传播逐渐与活动影像相结合,如电影、电视,直至当下的网络视频,对于社会生活的影响愈益增强。清末、民国时期,唱片几乎是唯一的聲音记录载体,在声音传播方面发挥的作用可谓举足轻重。近代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声音传播的影响区域主要是以通商大埠为中心的城市。利用、享受声音传播,主要是城市社会的生活方式。唱片在近代社会中,首先是商品,具有其他商品都有的品格;其次,唱片是文化产品,具有一般商品所不具有的一些特点,如艺术情趣、思想格调、政治倾向等,这是政府要介入的原因。近代中国唱片生产本身,也具有研究价值。借助于成为史料的老唱片,可以从声音角度勾勒出近代中国城市社会生活史的脉络,用听觉感知历史的生动。唱片作为新史料,具有形式新、内容新、角度新,以及高度真实的特性。近代中国唱片产业的规模效应保证了唱片作为史料的物质基础,而成为无线电台广播的重要素材,又使唱片具有了史料所必须的社会基础。聆听清末、民国时期的老唱片,耳际回荡着近代城市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声音,眼前不禁浮现一幕幕的历史场景,由是得以构建起以声音为角度的近代城市社会史观。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建立在近代科技基础上的近代社会生活、尤其是城市社会生活,极为纷繁复杂、多姿多彩。解明近代城市社会生活史的真相,探究其规律,可以从包括声音在内的多个角度出发,采用包括唱片在内的多种实质上为近代科技产物的新史料。唯其如此,才能还原出全面、丰富、真实的近代城市社会生活场景,探索出近代城市社会生活史的规律。

<sup>1</sup> [清]袁枚编撰、申孟、甘林点校:《子不语》卷十三“江秀才寄话”,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6月版。

<sup>2</sup> [清]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三卷第308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10月版。

<sup>3</sup> 《走向世界丛书 出使英法比四国日记》第575页,钟叔河主编、薛福成著,岳麓书社1985年8月版。

<sup>4</sup> [清]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三卷第307页。

<sup>5</sup> 同注释2。

<sup>6</sup> [英]傅兰雅辑:“格物杂说 新制记声器图说”,《格致彙编》1890年春季卷,上海格致书室



---

发售。

<sup>7</sup> 同上。

<sup>8</sup> [清]高昌寒食生（何桂笙）：“留声机器题名记”，《申报》1890年5月3日。

<sup>9</sup> 《时报》第二百五十九号第四页第一张，1905年3月2日。

<sup>10</sup> 《申报》第二张后幅第八版，1910年4月21日。

<sup>11</sup> 上海档案馆所藏档案 B91-1-27。

<sup>12</sup> 《申报》，1931年11月24日。

<sup>13</sup> 同注释 11。

<sup>14</sup> 同注释 8。

<sup>15</sup> 洪法：“谈言——以留声机取供”，《申报》1937年5月12日“本埠增刊”。

<sup>16</sup> 《申报》，1932年10月15日。

<sup>17</sup> 同上。

<sup>18</sup> 上海档案馆所藏档案 Q275-1-2045，第 10 页。

<sup>19</sup> 上海档案馆所藏档案 B91-1-27，第 2 页。

<sup>20</sup> 上海档案馆所藏档案 B91-1-27。

<sup>21</sup> 据《旧中国的上海广播事业》（上海市档案馆、北京广播学院、上海市广播电视局合编，档案出版社、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85 年 12 月版）中提供的数据统计而成。